

# 晚清的現代性：以晚清科學小說為觀察文本

柯喬文

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班應屆畢業生

月亮阿！月亮！我們祖國，偌大的地方，竟沒有幾箇人像你一般模樣，照得我心事出來的。可惜你離我太遠，可惜我身無兩翼，不能從這骯髒髒的世界，飛到你清清白白的世界裡去。

——〈月球殖民小說〉(1904)

百年前的 12 月 17 日，萊特兄弟進行動力飛機的試飛，雖然僅僅遨翔了十二秒鐘，但是透過科學的反覆測試，人力競天，使過往的神話禁咒、人類想望，得以落實<sup>1</sup>。

回首百年，有清歷經外力入侵與條約簽訂，此時直如半殖民的處境，放在整個文明歷史的進程，學界對於中國「現代」的起界，一般推定於十九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（1840-1842，道光 20-22），不唯是西方軍事力量的兵臨城下，更是在船堅砲利的長驅直入，唯我獨中的地位，受到西方先進的器物文明，逼迫的開始，時移事往，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，日益逼仄，遂有曾國藩（1811-1872）「三千年未有之變局」的喟謂，中國於是走到了變與不變的關口，隨著政治場域的變動，文學界也興起變革的湧動，其中，以梁啟超（1873-1929）的主張，繼承與革命了傳統的文類，堪為代表，近人陳平原（1954-）觀察到晚清文學的兩個現象，「當他們（案：新小說家）聲稱反叛傳統時，分明拖著一條長長的傳統尾巴；當他們表示皈依傳統時，分明又現出西方的影響」，以及「新小說發展的內在動力主要來自域外小說與傳統文學」<sup>2</sup>。

中國知識份子亟思模仿西洋文明，就連文學場域亦受到連動，署名「俠人」在〈小說叢話〉一文，指出「西洋小說尚有一特色，則科學小說是也。中國向無此種，安得謂其勝於西洋乎？應之曰：『此乃中國科學不興之咎，不當在小說界中論勝負。若以中國大小說家之筆敘科學，吾知其佳必遠過於西洋』」（《新小說》

<sup>1</sup> 古希臘神話中，戴達羅斯（Daedalus）是為擅長各種技藝的巧匠，與兒子伊卡羅斯，被克里特島的米諾國王囚禁，父子遂以蜜蠟黏合羽毛成為雙翼，企圖飛出牢籠，其中，伊卡羅斯由於過於靠近太陽，蠟翼遇熱融化，墜海而死，戴達羅斯則順利到達西西里島，替國王科羅斯建造水渠等基礎建設；此神話某種程度上，暗示了人類欲挑戰自然極限，可能也要付出相當代價。

（德）舒維普（G.Schwab，1792-1850）：《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》（1837），齊霞飛，（台北：志文，1986年9月初版），頁83-85。

<sup>2</sup> 陳平原：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（1897-1916）·新小說的誕生》，收入氏著：《陳平原小說史論集（中）》（石家莊：河北人民，1997年8月初版），頁586。，頁593、594。

13 號，1905），接著列舉《鏡花緣》、《蕩寇志》、《西遊記》等書，「科學小說」一名，則以此文為早出；在此之前，已有凡爾納（J.Verne，一譯維勒，1828-1905）〈月界旅行〉（1865，1903 中譯）等一系列翻譯小說，以及〈月球殖民地小說〉（1904）、〈女媧石〉（1904-05）等創作的面世，同年則有《新法螺先生譚》一書的出版，內容包含天笑生（包天笑）翻譯的〈法螺先生譚〉與〈法螺先生續譚〉，以及東海覺我（徐念慈，1875-1908）仿寫的〈新法螺先生譚〉，文長萬餘字，描寫法螺先生漫遊月球、火星、金星，作一星際旅行，上述所舉，雖為寥寥數例，但正可見晚清文人將科學與文學結合的企圖。

本文擬以〈月球殖民小說〉出發，旁論相關晚清科學小說，藉以探討科學小說與現代性的關係。

## 一、「現代」的強制性

中國「現代性」(Modernity)的發生，在晚清時已經出現，考察所謂的「現代」(modern)的諸概念，是來自西洋的，用以區辨希臘、羅馬的君權時代，以及中古以神為主的時期，那時「人」，是附屬於上帝的神聖概念之下的，到了十六世紀以降，「人」逐漸有了主體性，從而擺脫上帝與君王限界，學者曾對「modern」一詞，進行字源學上的考證，形容詞「moderne」，作為法語單詞的出現，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，其形容詞更可上源到五世紀的拉丁語單詞「modernus」：

最早使用modernus這個詞的，是一個叫卡西奧多爾的拉丁作家。當時這個詞的意思是指基督化了的「現今」，以區別古羅馬異教的「往古」。在整個中世紀和十七世紀以前，modernus及其俗化形式moderne，意思都與「往古」相對，是指「現今」的意思，即相對於「古」而言「今」……十七八世紀之交，法國發生了著名的「古今之爭」，經過這場基本是文學性質的爭論，moderne一詞，除了原有的「現今」意義之外，還獲得了「今勝於古」的意味。<sup>3</sup>

於是「現代」的意義，即是人存在、受重視的開始，後來，更被賦予「今勝於古」的進步觀念，至於，「現代化」(modernization)，一般多指器物層次的發展，需說明的是，有現代性的器物，未必具有現代性，因此，現代化的導入，只是現代性發生的可能，非因果的必然關係，這，即是一個現代化與現代性差別的例子。

進一步地考察，現代性（法文modernité，英文modernity）一詞，其出現約在 1850 年前後，其首創之功，一般歸自波德萊爾（C.Baudelaire，1821-1867）的文章，一說，則為法國浪漫派作家夏多伯里昂，其《墓穴彼界的回憶》（1841）一書，有「海關與護照的世俗性和現代性，與暴風雨、歌特式大門、號角和激流

---

<sup>3</sup> 河清：《現代與後現代·「摩登」的起源》（香港：三聯，1994 年初版），頁 17-18。

之聲相對照」，當為早出<sup>4</sup>，然而，依據學者的研究，「現代性」的意義，一直是含混不清的、出格於美學等範圍之外的，從字源學來說，最初在法語的用法，至少具有三種含意：表示某特定的歷史時期、現代性事物所具有的特性、波德萊爾首作概念性定義，波德萊爾在《現代生活的畫家》用了此詞，他說道「現代性」的追尋：

他在尋找什麼呢？無疑，這個我所描述的人，這個想像力活躍的孤獨者，總是穿行在「人類的大沙漠」之中，他的目標高於一個單純的遊蕩者的目標，他的目標範圍更廣，並非出自一時的心血來潮。他在尋找某種我們可以稱之為「現代性」的東西。<sup>5</sup>

尋找「現代中國」(Modern China)的進入，向來說法眾說紛紜，約有三說，一是明末清初，耶穌會教士東來，除了宗教的傳播，也帶來天文、曆法、數學等西方技術，一是當始於鴉片戰爭，帝國主義正式對中國進行侵略，一則是推遲至甲午戰後，其中第二說，以十八世紀的四〇年代，作為「現代中國」的開端，則贊成者眾，歷史學者如范文瀾(1893-1969)、榮孟源(1913-1985)、李新(1918-)、胡繩武(1923-)、戴逸(1926-)，以及張玉法(1935-)等人均主之<sup>6</sup>；至於文學界，則有林明德(1946-)<sup>7</sup>、王德威(David Der-wei Wang, 1954-)別幟「晚清」<sup>8</sup>，當從1840年起，以迄1911年，將過去晚清在1904-1911年的限界，向前推進，如此，現代性的到來，是與「晚清」的概念相結合，時間則上溯十九世紀中葉。

中國自明人鄭和(1371-1435)出航後，隨任龐大艦隊在南方港口停用腐朽，清初，為了台灣問題，將東南沿海居民遷界、海禁，事畢則頒佈「不許片帆入海」的禁令，此時，正是西方(尤指歐洲)海權興盛的時代，重商主義、工業發達、求進步的慾望驅使著國民向外發展、爭取利權，而在中西接觸時，中國對於西洋所持觀感，「奇技淫巧之嫌」「所格之物，皆器數之末；而所窮之理，又支離神怪而不可詰，是所以為異學耳」，以上出於《四庫全書》中的若干文字，或可窺見當時知識份子與朝官的心態。

歐洲由於工業進展，大量產品急需市場消費，加上中國以茶葉、絲綢、瓷器等物外銷，出超過多，導致國際貿易收支失衡，西洋主要國家虧仄，因此企圖以

<sup>4</sup> 河清：《現代與後現代·「摩登」的起源》，前揭書，頁22。

<sup>5</sup> (法)瓦岱演講：《文學與現代性》，田慶生譯，(北京：北京大學，2001年7月初版)，頁20-23。

<sup>6</sup> 張玉法：〈現代中國史的分期問題〉(1974)，張玉法主編：《中國現代史論集·第一輯：總論》(台北：聯經，1980年3月初版)，頁3-21。

<sup>7</sup> 林明德：《文學典範的反思》(台北：大安，1996年初版)。

<sup>8</sup> 王德威：《被壓抑的現代性：晚清小說新論·中文版序》，宋偉杰譯，(台北：麥田，2003年8月初版)，頁9。

需要說明的是，本文與王德威教授所關懷的命題，頗多相應之處，唯論文構思、提交大綱與寫作階段(2003年1月至8月)，此書尚未有中文本的譯出，然其珠璣話語，已部分呈現在〈賈寶玉坐潛水艇——晚清科幻文學新論〉、〈沒有晚清，何來五四？——被壓抑的現代性〉等文章中，而《被壓抑的現代性》一書的出版，曾及時提點筆者在思慮未周之處。

鴉片換取白銀，未料在鴉片一役中，取得勝利，順利打開貿易的孔道、取得傳教權利，於是在宗教與貿易的熱誠中，打著「白人負擔」(white man's burden)的旗幟，進入中國，而中國除了遭受白銀外流的經濟危機，在社會層面，更被迫接受外來的現代性，用湯恩比(A.J.Toynbee, 1889-1975)的話說，即是各文化間的「挑戰與反應」(challenge and response)，在軍事實力不對等的情况下，中國現代化的歷程，幾幾乎乎等同於西化(Westernization)，也就是通過外力侵逼、或外發性(exogenous)而產生的現代化，而非中國自古發展、內發性(indigenous)的現代化<sup>9</sup>，須指出的是，此自發的歷史累積，在中國任何一時期中，都在發生，然而在鴉片戰爭後，西風壓過東風，這點，存在於許多被殖民地的經驗中。

這樣由外鑠我、而凌駕內部發展的方式，即是強制的現代性(Forced Modernity)，它的到來，造成中國內部意見的眾多分歧，有或官僚體系的因循苟且，有或反對學習西洋，如王闈運(1833-1916)、張自牧(生卒待查)等人，力主「機器無用」論，王闈運以為：

火輪者，至拙之船也，洋砲者，至蠢之器也，船以輕捷為能，械以巧便為利；今夷船煤火未發，則莫能使行，砲須人運，而重不可舉，若敢決之士，奄忽臨之，驟失所恃，束手待死而已。<sup>10</sup>

這種對於西洋「陌生技術」的排斥，有學者指出，「堅船利砲」實是「一種邪惡與威脅的代表」，於是乎，力主西化的郭嵩燾(1818-1891)，曾感嘆朝中「一聞修造鐵路電報，痛心疾首，群起阻難，至有以見洋機器為公憤者」<sup>11</sup>，則是集體防衛機轉的反應。

即便如此，亦不乏有識之士，在鴉片戰後，即相繼提出因應時局之道，林則徐(1785-1850)、魏源(1794-1856)、徐繼畲(1795-1873)、梁廷柅(1796-1861)諸人，以為非得引進、翻譯、仿摹西學，否則無以救國強種，這說明了危機正是轉機的可能，如陳次亮(生卒待查)以為，西人挾科學技術，正給予國人改進「器」的良機<sup>12</sup>，而魏源則主「師夷長技以制夷」，英法聯軍之後，則有馮桂芬(1809-1874)、郭嵩燾、王韜(1828-1897)、鄭觀應(1841-1922)，嗣後，更有嚴復(1853-1911)、康有為(1858-1927)、梁啟超等人的繼起，一波波新知識份子逐漸打開視域，為晚清文化帶來多元的面貌，並後來的五四文學革命，提供豐富的滋養。

<sup>9</sup> 金耀基：〈現代化與中國現代史——提供一個理解中國百年來現代史的概念架構〉(1969)，張玉法主編：《中國現代史論集·第一輯：總論》，前揭書，頁120。

<sup>10</sup> 清·王闈運：〈陳夷務疏〉，氏著：《湘綺樓文集》卷二(台北：新興，1956年3月初版)，頁41。

<sup>11</sup> 金耀基：〈現代化與中國現代史〉，前揭文，頁125。

<sup>12</sup> 清·陳次亮：《庸書·內篇》(1896)(台北：台聯國風社，1970年版)。

## 二、晚清科學小說的現代視野

晚清時期，現代性已經逐漸取得合法論述，關於科學、進步、平等諸概念，成爲知識份子追求實踐的目標，這些種種，在〈月球殖民地小說〉的小說敘述中，可以清楚地觀察到。

〈月球殖民地小說〉(下文簡稱：〈月〉)，係由「荒江釣叟」署名創作，原刊於《繡像小說》21號至62號，從1904年(光緒30)3月開始連載，次年11月終止，目前僅見至35回的殘本(附錄一)，同時未有單行本的出版<sup>13</sup>，《繡像小說》爲晚清四大小說雜誌之一<sup>14</sup>，1903年夏天，由上海的商務印書館發行，主編李伯元(1867-1906)主導一系列譴責作品，包括自己的〈文明小史〉、〈活地獄〉，以及劉鶚(1857-1907)〈老殘遊記〉、蘧園(歐陽鉅源，1883-1907)〈負曝閒談〉等小說，有學者指出，《繡像小說》是「晚清狂諷藝術表現最淋漓盡致的一個刊物」<sup>15</sup>，再者，署名「商務印書館主人」在〈本館編印《繡像小說》緣起〉，說明「歐美化民，多由小說」或對人群之積弊而下砭，或爲國家之危險而立鑑，由此觀之，可見其編輯取向，是在梁啓超「新小說」的觀念脈絡中，進行諷刺社會醜象的揭露，唯其發行壽命止於1906年(光緒32)，爲期三年。

〈月〉的故事，主要是從孟龍華一家爲主線，開展情節，孟龍華依從士子登科，見時局板蕩，上一奏策，未料朝官老大，欲治其罪，孟氏遂落難海外，在一次翻船意外中，孟氏夫婦人散兩地，夫人後爲美人所救，寓居紐約，孟氏與日本友人，搭乘氣球，前往尋妻，先後歷經英、美等帝國景觀，也前往印度等殖民地，見證帝國與現代性的某種牽扯。

晚清小說創作者，以傳統的敘事模式、古典用語，來承載新說，〈月〉即是模擬舊昔說話人的底本，進行章回故事的敷演，首回「李安武避難芙蓉國 龍孟華遇險蘭箬河」，以「話說」起興，交代時空背景是位於同治13年(1874)之後，時國事日下，西洋勢力已侵逼南洋，成爲外人的「保護地」，而東洋日本在1867年，面對西方軍船的叩關，被迫結束鎖國政策，遂主「脫亞入歐」，經過幕府末代將軍一橋慶喜(1839-1915)大政奉還之後<sup>16</sup>，明治天皇(1852-1912)與其佐

<sup>13</sup> 清·荒江釣叟：〈月球殖民地小說〉，參見清·李伯元編：《繡像小說》(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0年12月重印)。

又見，林明德等編：《晚清小說大系·月球殖民地小說》(台北：廣雅，1984年3月初版)，頁1-218。

<sup>14</sup> 晚清四大小說雜誌，一般是前期的《新小說》(1902.11-1906.1，24期)、《繡像小說》(1903.5-1906.4，72期)；後期的《月月小說》(1906.11-1909.1，24期)、《小說林》(1907.2-1908.10，12期)，分別由梁啓超、李伯元、吳趸人(1867-1910)、黃摩西(1866-1913)等四人主編，深刻地影響雜誌的走向。

<sup>15</sup> 楊義：〈晚清四大小說雜誌(上)〉，楊義、張中良、(日)中井政喜：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圖志(上)》(台北：業強，1995年1月初版)，頁17。

<sup>16</sup> 一橋慶喜(1839-1915，77歲)，於1866年就任將軍一職時，恢復「德川慶喜」原姓，爲江戶時期(1603-1867)第十五代將軍，次年則大政奉還於睦仁親王(明治天皇，1867-1912在位)，當時有所謂改革派份子，以「尊王攘夷」與「倒幕」爲口號，如西鄉隆盛(1827-77)、吉田松陰

臣採取一連串的維新政策，形成新氣象，故事中的主角龍孟華，即是與新興國家的藤田玉太郎，共同進行一趟尋妻之旅，藉此漫遊帝國的現代性，而玉太郎「奉著政府裡的指意，游覽地球一周，以便將來開闢殖民地方」，亦可見日本作為新興帝國的企圖。

### （一）現代技術的展示

〈月〉作為科學小說的類型，其故事的整體核心，仍以晚清小說所關懷的「保種強國」的基調，以為貫串，其中，賴以周遊萬國的科學技術，即為氣球，氣球（balloon）作為一種飛行器，外觀為一大型氣密球囊<sup>17</sup>，內建淨室、客廳、臥室、天文臺、體操場、大餐間等活動起居所需，其原理是空氣浮力，利用氣輪鼓動而驅進（第五回），然而，氣球一物，並非無的想像，早在於 1782 年 11 月 21 日，便由法國蒙高爾費兄弟發現空氣漂浮的可能，進行首次不載物飛行成功，其球囊內充飽熱空氣與輕於空氣的氣體（如氦、氫），藉以產生浮力，隨後人類待在天空時間，越來越長，遂得以進行飛行以外，如科學觀測的任務，同時，隨著高度的攀升，人類體能會產生不適的現象，在〈月〉中的敘述，已經具有初步的物理知識，知道氣球的飛行，需具有若干要素配合：依賴空氣、地心吸力的作用、天空寒氣的限制、旋風的不可控制（第十三回），此一問題，在當時尚且無法解決，直到 1931 年，由皮卡德發明載人的密封艙，獲得克服<sup>18</sup>。

晚清小說，對於新鮮事物的仿摹與引介，是不遺餘力的，在〈月〉中，以平常物件的姿態，反覆出現在故事中，如電報（第三回）、德律風（電話，第三回）、電燈（第七回）、自鳴鐘（第七回）、電汽車（第九回）、千里鏡（第十三回）……等，亦即電、力、熱等科學為發端的諸名詞，吸引晚清小說家的目光，將之納入書寫，使得小說洋溢著現代風情，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特殊需要或場景，這些物件並不刻意強調其功能，以及背後的現代思維，而以化入背景的方式，點綴情調，如自鳴鐘所代表的時間規訓，深刻影響人類生活形態的意義，小說中並無發揮。

再者，現代技術的展示，以擬科學的方式出現，一方面實證的步驟，演繹其功效，一方面則以迷信的舊說，反襯科學的合法，這樣的論述方式，出現在醫學的治療上，一日，龍孟華急血攻心，經由孟買當地的西醫「哈老」，以「透光鏡」診治、手術開膛洗淨內臟，再以藥水擦拭傷口，事畢，竟完好如初，在此同時，

---

（1830-59）、大久保利通（1830-78）、木戶孝允（1833-77）、高杉晉作（1839-67）等，這些人主要集中在長州（今山口縣）、薩摩（今鹿兒島縣）、土佐（今高知縣）、肥前（今佐賀與長崎縣）等西南部強藩，由於接受西潮較早等因素，於是與幕府將軍，採取不同的政治態度，最後經過多年奔走，如願以償。

<sup>17</sup> 至於，在飛機發明以前，空中的飛行物尚有飛艇，係於 1852 年，由法國人吉法爾，用氣囊、推進器與掌理方向的舵，共同組成飛艇，一度研擬載人運輸，為因安全性與穩定性不足，而被迫作罷；凡爾納的《星期五熱氣球之旅》（1862），即是以此為題。

<sup>18</sup> 以上飛行簡史，參見：

王鴻生：《世界科學技術史（修訂版）·現代主導技術的突破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，2002 年 7 月二版二刷），頁 412-419。

則塑造一個幫襯人物：賈西依（音諧「假西醫」<sup>19</sup>），此人出身中國江西，在上海的中外藥房見著世面，隨後與一外國人士，離開中國，以有限的醫術謀生，實有暗諷淺嘗洋墨水而招搖過市者的意味，然而，故事的高潮在於，哈老不但能診治尋常疾病，更能斷言其心敗壞的原因，儼然為全體中國人把脈：

你這心想是自小用壞的。我聽見有人說起，中國有種甚麼文章叫做八股，做完八股完全之後，那心房便漸漸縮小，一種種的酸料、瀆料，都滲入心窩裡頭，那膽兒也比尋常的人小了幾倍。（第十二回）

接著，開了道診治龍氏的藥方，「以後再休做那八股」「尋常的筆墨，也以少動為妙，怕的舊病復發就沒醫治了」，如果說話人刻意橫插這段情節，龍夢華的「龍」，即為龍的子民，稱代了所有中國人，那麼哈老作為智慧先知，則為國民性提出砭治<sup>20</sup>，並且，在歷史的吊詭下，中國科舉於1905年正式廢止，拔除哈老指陳的病根。

科學技術的發達，使得二度空間的行動，陡然提升為三度空間的漫遊，於是，空間的跳躍與搜索，讀者更得以增廣見識，與中國傳統神話型、桃花源式的故事相較，傳統情節往往是以「莫名闖入」，作為其進入異地的合理性，其離去亦是便扶向路，桃花源往往呈現得是：靜態的樂園樣態，自有其中國深層的文化基質，有學者以為「忽逢」與「不復得」，正是無分別與分別心所起的作用使然<sup>21</sup>，「尋向所誌，遂迷，不復得路」，便不得不成為這類故事的最後遭遇；〈月〉的敘事企圖，顯然不止於此，更想推前去看看理想國度的所在，於是像全幅地景式的展覽，便在文字間，舒展開來。

晚清科學小說，不滿足於靜態的避世國度，而是投射想像於「烏托邦」式的無有之地（no place），更重要的是，透過烏托邦的想像，構建未來新中國的圖景；「烏托邦」一詞，係來自外來語「Utopian」，從字源學看來，其為「Uotos」在希臘文中是由Ou（no，「無」的意思），與topos（place，「場所」）兩種意義組合而成，因此即是「世上所無的場所」，到了十六世紀，英國政治人物摩爾（Sir T. More, 1477-1535）寫作《Utopia》（1516，中譯《烏托邦》）一書，烏托邦大致意義便出現，是作為現實世界的對照之用<sup>22</sup>。

---

<sup>19</sup> 透過諧音，以暗諷人物性格、提示故事方向，如《紅樓夢》的「賈雨村」（音諧「假語存」）、《孽海花》的「丁雨汀」（音諧「丁禹廷」）、方代勝（其字安堂，影射袁世凱）等隱語、影射，早已做過示範。

<sup>20</sup> 「國民性」一詞，係從日文的「kokuminsei」轉譯而來，而日本亦是輸入自英文「national character」；「國民性」，後來成為五四文人所檢討的命題。

<sup>21</sup> 廖炳惠：〈嚮往、放逐、缺匱〉，氏著：《解構批評論集》（台北：東大，1985年9月初版），頁31。

<sup>22</sup> 有學者徵引張惠娟對於「樂園神話」與「烏托邦」的辯析，以為樂園神話是「靜態、懷舊、消極、出世、及強調放任、無為、獨善其身」，而烏托邦則具有「動態、前瞻、積極、入世、及強調政治、社會層面」的意義。參見：

晚清科學小說中，即有一篇〈烏托邦遊記〉，作者題為蕭然郁生，刊載於《月月小說》創刊號上(1906.11)，其首回「談嗜好生平喜遊歷 得奇夢異地遇高僧」，談及英人侘麻斯摩爾有小說《烏托邦》行世，而赫胥黎(T. H. Huxley, 1825-1895)的名著《*Evolution and ethics*》(1893，中譯《天演論》)，亦有「烏托邦」一詞，而主角欲遊其地，則須至「何有鄉」乘船，何有鄉即無有之地，其景芳美卻蕭瑟，除大荒山、無稽崖外，僅皆空寺內住一老和尚，老和尚授予其作《烏托邦遊記》，並要求「將這部書寄至上海月月小說社裡出版，告訴世界上人，知道這個地方」，以下的故事情節，均係此書的繼載，烏托邦則為此揭露。

晚清所在的現實「是世界」(yes-word)，與烏托邦所代表的「非世界」(no-word)，兩者並現在科學小說中<sup>23</sup>，某種程度上說，作者企圖以小說為教化的工具，一方面呈現晚清政府與泰西先進國家的對比，一方面傳達理想世界的想像樣貌；在「是世界」的描述中，若毋論氣球作為飛行器，其移動速度的誇張<sup>24</sup>，則其對於世界地理空間的認知，尚可稱為真確，這是在鴉片戰後，中國人對地理知識的逐漸重視與掌握、以及認真地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，翻改〈四庫全書提要〉對利馬竇(Matteo Ricci, 1551-1610)《坤輿圖說》、艾儒略(Jules Aleni, 1582-1649)《職方外紀》的地理書寫，皆據中國《神異經》等書的不當評語，「因依倣而變幻其說，不必皆有實跡」，如此改變，可歸功於林則徐(1785-1850)命人翻譯《四洲志》、魏源(1794-1857)繼之，編纂《海國圖志》等系列的地理書籍，以及士人如康有為(1858-1927)、李鴻章(1823-1901)、薛福成(1838-1894)、黃遵憲(1848-1905)、戴鴻慈(?-1910)等人遊宦外國的紀錄，拓展了國人視野，正如學者指出其深遠的影響：

第一是將世界歷史的發展文本化，使數千或數百年的異國歷史，透過文本的簡短形式縱時地再現於當下。第二是將這種再現結果與中國的國祚相連結，使中國的現在與未來能置放在萬國的世界中來評斷。這種認識和評定能力的增長，使中國的知識界陷入前所未有的焦慮。<sup>25</sup>

既然中國不再是萬國中心，則其出發與回歸，在〈月〉的鋪排下，則是始於中國、流浪他地、往之異鄉(無有之地的悖反)，離開中國，是因為國內吏治敗壞，於是在一連串的工作中，讀者可以輕易地見證龍孟華所代表的中國人，所心

---

張惠娟：〈樂園神話與烏托邦——兼論中國烏托邦文學的認定問題〉，《中外文學》十五卷三期(台北：台灣大學外文系，1986年8月)，頁84。

「烏托邦專號」，《當代》六十一期(1991年5月)，頁22-65。又：

(英)摩爾：《烏托邦》，戴錕齡譯，(台北：志文，1997年4月初版)。

<sup>23</sup> ( ) 芙蘭西絲·高爾芬·芭芭拉·高爾芬：〈論烏托邦的可能性〉，凱特布編：《現代人論烏托邦》，孟祥森譯，(台北：聯經，1980年11月初版)，頁51。

<sup>24</sup> 氣球移動的快速，今日所見無疑是匪夷所思，如：從亞洲的松蓋芙蓉，搭乘氣球到紐約，僅需四點鐘(第七回)，然而，隨著文學逞思，科幻的情節是可以被讀者所認可的。

<sup>25</sup> 黃金麟：《歷史、身體、國家：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(1895-1937)》(台北：聯經，2001年1月初版)，頁185。



儀的法政制度、平權思想、人道關懷等面向，相較於「中國的領事官，他到我們地方來，也不過爲了幾箇錢，剝削剝削他們中國的百姓，在我們政府權力下混過日子罷了」（第七回），對國人則厲色內荏「我們中國的子民委實討厭得很，樂得等別人替我們管管也好」（第八回），顯然，有取法東西洋各國的地方。

氣球旅行，除了見證歐美國家的文明昌盛，更在印度洋外的群島，隱喻了中國的弊病，這樣的筆法在《鏡花緣》中，已有演練，從毛人叢聚的蝙蝠島開始（第十三回），接連搜索中，看見勒兒來復島、魚鱗國、魚鬚國、尚仁島、司常煞兒島等人煙景觀，其中，第十六回的「勒兒來復島」，與中國關係最深，除了血緣深厚外，其典章制度亦多承襲，讀書「除卻程朱兩公所傳的書本，其餘一概是不准看的」，玉太郎隨氣球降落此地，但聞有人爭辯「用夷變夏」「尊王攘夷」，卻見當地人以古式馬車對抗毛瑟武器，好一個「海外兵車留古法 千秋萬歲說天朝」的地方；總的來說，這趟諸島搜索，表層故事是以「風俗惡劣」（第十九回），對照歐美的文明先進，背後則是暗寫中國的不文之處。

## （二）現代性的接觸

既然中國不可期、西洋各國又站在壓迫方，〈月〉的故事編造中，龍孟華遂傾慕東洋日本，而在地球之外尋找烏托邦，則是故事呼之欲出的出口，「地球—氣球—月球」，中國歷代幻想嫦娥偷藥奔月、玄宗遊月偷曲，透過技術發達，終抵幸福彼岸。

中日交流，由來已久，如日人遣唐以習儀軌，然而，在十九世紀的列強叩關下，幕府施政則不敵世局變化，晚清詩人黃遵憲，觀察幕末日本是「霸權久竊，民心積厭，外侮紛乘，內訌交作」<sup>26</sup>，遂有 1868 年的「王政復古大號令」，歸政文皇，施行立憲維新，日本逐漸躋身強國之列，1871 年（同治 10 年、明治 4 年）9 月，中日訂立〈中日修好條規〉，「兩國所屬邦土，亦各以禮相待，不可稍有侵越」<sup>27</sup>，開啓中日正式外交的首頁，也是少數的平等條約，並且促進中日官民的密切交流，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（1838-1918）在《使東述略》一書中，以爲：

環視五大部州，惟中土壤地相接，唇齒相依，果能化畛域、聯輔車，則南臺、澎、北肥、薩，首尾相應，呼吸可通；是由渤海以迄粵閩，數千里門戶之間，外再加一屏蔽也。

這樣的形勢估判，以及長期交流的經驗，某種程度上，說明中日結盟的可能性，然而，日本雖然朝著富國強兵勇邁而去，可是，故事中的龍孟華，始終未踐履日本土地，而是逗留在現代性景觀的倫敦與紐約，其譜列文明進程的順序，顯然可知。

「現代性」，某種程度來說，是建立在科學——技術合理性的發展上，然而，

<sup>26</sup> 清·黃遵憲：《日本國志》（1895）卷一。

<sup>27</sup> 〈中日修好條規〉，收入：《同治條約》卷二十。

中國，在鴉片戰爭的經驗中，見著的是槍砲傷人的「陌生技術」，因而心裡拒斥，隨著時間遞移，陌生技術逐漸進入生活中，成為新鮮好奇的對象，再進一步體認為保種救國的技術，話說玉太郎與孟氏的一趟倫敦旅程中，所搭乘的新式氣球，竟引得各種科學學者生徒，前往研究，不只是利權爭奪問題，而是涉及民族存續的較高層次：

黃種的文明日日進步，白種的文明便日日減色，將來滅國滅種都是意中之事。（第九回）

現代性伴隨種族主義的興起<sup>28</sup>，「保種」「強國」是當時普遍的思潮與基源問題，然而，令人驚訝地是，敘事者大膽提出「月球殖民地球」的前衛思想（第三十二回），頗有古訓「世界大同」的意味，但此大同，是建立在謀求人類文明的集體合作，以禦外星文明的殖民。

〈月〉提出救國的可能，除了科學技術，更要提高集體知識，「女學」便在此思維下，被刻意著墨。

梁啟超在〈變法通議〉一文中，將國家治亂聯繫於女性智識的開啓，以為「治天下之大本二，曰正人心，廣人才。而二者之本，必自蒙養始。蒙養之本，必自母教始。母教之本，必自婦學始。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」，正是反應戰爭屈辱的自省經驗，並總結張之洞、康有為等有識之士，從提倡女性外在纏足的解放，到智識提升的特殊歷史經驗，這樣女學倡議與國族論述結合，就是故事裡唐蕙良在女學堂教習，「年紀三十多歲，立意不嫁，專在中國及南洋一帶地方，教化人家女兒，勸人家女兒讀書」（第三回），背後的隱性思維，即是透過教育，「立志要把我同胞的幾萬萬女子一齊度到文明世界」（第四回），因此，關於女性教養的機構，刻意地語多著墨，如女學校（第十回）、女教堂（第十一回）等施教場所。

〈月〉的敘事者，直指傳統對女性養成偏頗的不當，力主女學對於救亡圖存的重要，所以，非傾全民兩性之力，無以挽狂瀾於將倒，此一「興女學」的思潮，最早是在 1876 年（光緒 2），由《申報》倡議的，在此之前已有西洋教士創辦新式學堂、成立女學，隨著保種的迫切需求，清廷接繼下詔改書院、興學堂（1901）之後，1907 年 3 月，學部頒定〈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〉、〈奏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〉，正式將女性教育納入近代教育<sup>29</sup>；小說中，關於女學課程，僅僅提及外國書籍的講授（第三回），此內容反映 1898 年首座國人創辦的中國女學堂的創立，以及顯示「國裡女學太少」，導致積弱的反省（第十回）。

<sup>28</sup> 原文為「國族主義」，2003 年 10 月 18 日第三場宣讀後，經與會學者清華大學徐光台教授的提點，修正為「種族主義」，同時間，還要向會議主持人交通大學蔣淑貞教授，以及學者如吳淑慧、朱學恒等人的提問，使得本文有精進的空間，在此致意。

<sup>29</sup> 廖秀真：〈清末女學在學制上的演進及女子小學教育的發展〉，張玉法、李又寧編：《中國婦女史論文集·第二輯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 年初版），頁 203-213。

### 三、現代性的變動

「科學的現代性」，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，相信物競天擇、適者生存的法則，而科學的進步是永無止境的，〈月〉卻適時給予反控，主要在兩方面，一是當時科學本身的侷限，以縱橫萬國的日本新式氣球，依然會面對空氣動力、地心吸力、高空寒氣、太空旋風等客觀條件，以致無法到達月宮（第十三回），因為人類科學的有限性（第三十二回），爲了達到月球，玉太郎是以夢（第十三回）、以病（二十三回）爲甬道，思接月宮，這說明作者面對科學書寫時的困境，一旦脫離科學，幻想本身有其侷限性，爲了讓情節順利推進，便又墮入傳統書寫異境的方式（如志怪小說的敘事模式），以幻夢含糊帶過，再者，晚清科學小說往往呈現兩極現象的交混，既啓蒙又迷信、理性而濫情、模仿與譎仿<sup>30</sup>，說明晚清社會的多重異質，若以單一的現代性去理解，似乎無法真切地重建當時的現實場域。

「現代性」進入殖民地，啓蒙當地人民，在帝國主義狂潮席捲世界各地時，是普遍被認知的權力話語，晚清說話人說著〈月〉的故事，是接受現代性的技術理性觀念，進行演述，然而，「現代性」在西洋是不斷發展其內涵，到了二十世紀面臨危機，隨著帝國間併吞激烈、資源爭奪、緩衝區域的逐漸消失等問題，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（1914-1918），人們重新反省，遂有第二階段的現代性進展；學者卡林內斯庫（M.Calinescu）曾在《現代性的五副面孔》一書中指出，所謂的「現代性」當有兩種分類，「資產階級的現代性」與「美學概念的現代性」，兩者之間有所裂縫：

（資產階級的現代性觀念），進步的學說，相信科學技術造福人類的可能性，對時間的關切、對理性的崇拜，在抽象人文主義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，還有實用主義和崇拜行動與成功的定向——所有這些都以各種不同程度聯繫著邁向現代的鬥爭，並在中產階級建立的勝利文明中作為核心價值觀念保有活力、得到弘揚。

相反，另一種現代性將導致先鋒派產生的現代性，自其浪漫派的開端，即傾向於激進的反資產階級態度。它厭惡中產階級的價值標準，並通過極其多樣的手段來表達這種厭惡，從反叛、無政府、天啟主義直到自我流放。因此，較之它的那些積極抱負，更能表明文化現代性的是它對資產階級現代性的公開拒斥，以及它強烈的否定激情。<sup>31</sup>

「美學概念的現代性」的萌發，顯示「科學至上」的論調，受到質疑，然而，中國在苦追西洋的步履，僅僅百年，無形中已認同與服膺西洋所提供、發展數百

<sup>30</sup> 王德威：《被壓抑的現代性·被壓抑的現代性》，前揭書，頁 45-72。

<sup>31</sup>（美）卡林內斯庫：《現代性的五副面孔》（*Five Faces of Modernity : modernism , avant-garde , decadence , kitsch , postmodernism* , 1987），顧愛彬、李瑞華譯，（北京：商務，2002年5月初版），頁 48。

年之久的價值觀，然而，時間上的落差，使得〈月〉中的人物，終究無法在地球覓得希望之地，只好透過想像，以月球作為庇蔭所在，這樣遙向西洋現代性致意的立場，使得中國的現代論述，始終無法擺脫西方歷史發展的規則，近來，有學者如王德威，企圖重新探索中國特殊歷史經驗下的「現代性」，提出「被壓抑」（repressed）的三種向度<sup>32</sup>，或許是值得深思，並擴展掘深相關的討論，如是，晚清科學小說，才得以在文學史上妥適地衡量估評。\*

---

<sup>32</sup> 王德威：《被壓抑的現代性：晚清小說新論·被壓抑的現代性》，前揭書，頁 40-41。

\* 本論文的完成，首先要向葉李華教授致意，由於他的邀約以及耐心的等稿，使得作品從容面世，而呂應鐘教授提供多年藏書，雖然未能充分引用，但他的慷慨，讓自己尤存感謝。

## 徵引與參考文獻，略

### 附錄一：〈月球殖民地〉章回一覽

| 章回 | 回 目                    | 章回  | 回 目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一  | 李安武避難芙蓉國 龍孟華遇險蘭箬河      | 十九  | 證仙蹤摩崖書大篆 驚幻影投谷下重泉 |
| 二  | 秋葉九問天悲俠友 美華廠夢月悼賢妻      | 二十  | 搜蟒穴含哀雕古樹 尋鶴巢起死踏枯籐 |
| 三  | 設祭筵義士讀哀辭 登講座名媛驚噩耗      | 二十一 | 面鏡崖鵠立候終宵 搜畫軸鵲啼傷永晝 |
| 四  | 痛父冤濺血芙蓉劍 哭土類感懷筱蕩軒      | 二十二 | 遇荒崖苦說灰心木 臨春宴怕嘗比目魚 |
| 五  | 興詩獄雙龍悲節烈 駕氣球兩鳳證團圓      | 二十三 | 拯表妹天涯嗟失路 憶慈親海外喜還鄉 |
| 六  | 登日報紐約街訪子 病風魔普惠院就醫      | 二十四 | 袖神鑣打死陶都監 開毒砲救回李總辦 |
| 七  | 助龍求鳳新婚到美洲<br>用狗監人惡捕欺中國 | 二十五 | 脫羅網萬人同祝壽 受株連千里急還家 |
| 八  | 怕交涉官場譚格式 探消息客地嘔心肝      | 二十六 | 賀生兒他鄉重聚會 遇相士隔座講因緣 |
| 九  | 誤中誤巧逢領事館 冤裏冤暗帶衛身槍      | 二十七 | 馬勒蘇送兒弄騙局 龍必大屬對破機關 |
| 十  | 解冤仇玉環談大義 看跳舞金燭訪奇蹤      | 二十八 | 美華廠名醫驗毒餅 待雪軒慈父哭靈柩 |
| 十一 | 看新聞鉤起填胸憤 搜故篋驚題哀髮詩      | 二十九 | 平康里仇讎快報復 飄飄廬夫婦慶團圓 |
| 十二 | 哈醫士滲藥洗心肝 王太郎撥雲尋島嶼      | 三十  | 看影畫家人聯姊妹 讀檄文志士憤仇讎 |
| 十三 | 拔寶刀夢破天囚獄 揮彩筆安排島國圖      | 三十一 | 彈氣雷島濱救同種 移石畫海外獲奇觀 |
| 十四 | 探蠻洞喜獲金剛石 倚胡床代抹薄荷冰      | 三十二 | 龍必大奇緣逢淑女 玉太郎急疾訪良醫 |
| 十五 | 遣劣僕南洋修密札 誤傻郎孟買覓行球      | 三十三 | 攜美眷游學廣寒宮 結奇緣賀喜美華廠 |
| 十六 | 入教堂女士談離婦 過孔廟諸生說攘夷      | 三十四 | 劫李公奸人焚學校 戮陶黨烈士殉津沽 |
| 十七 | 魚鱗國巧扮蘭花指 鼠尾洲凝思楊柳腰      | 三十五 | 哭英雄海上葬衣冠 談家世洞中傳蟒玉 |
| 十八 | 陟瑤峰折臂駭獅威 題錦軸濡毫摹鳳印      | ——  | ……（未完）            |

本論文係於「中文科幻研究：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」科幻學術會議（2003年10月18日）上宣讀，經由主辦單位交通大學圖書館科幻研究中心，以及作者同意，刊載於「奇幻文化藝術基金會」網站，謹此說明。